

他也许没有想到，轰轰烈烈的自立军起义只在历史上留下淡淡的一笔，而他因透露中俄密约被慈禧杖毙却在史册上凝成悲壮的一页。

苏世独立一狂生

——记被慈禧杖毙的记者沈荃

竹杖，打在奄奄一息的身体上。

飞起又落下，落下又飞起。空中划过的痕迹让人头晕目眩，带起的呼呼风声让人耳中轰鸣。

血，满地的血，就这么飞溅着，就这么汨汨流着，仿佛永远也流不完。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整整四个小时，可他还没有死。

他请求狱卒快一点结束他的生命，于是，一条绳子勒进了他的脖子。

他的身体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名字却留在史册里。

他也许没有想到，轰轰烈烈的自立军起义只使他在历史上留下淡淡的一笔，而他因透露中俄密约被慈禧杖毙却使他在史册上凝成悲壮的一页。

感时思报国

1879年，7岁的小沈荃跟着他的哥哥来到了岳麓书院，千年

学府又多了一个小小的求学者。但是，他却仿佛命中注定不属于这与世隔绝的治学之地，走上了另一条漫漫不归路。

沈荃生于 1872 年，原来叫沈克誠，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他潜往北京，为防止别人了解他的行踪，就改用了沈荃这个名字。

沈荃小时候很不讨亲戚的喜欢，这是因为他性情特别直率，脾气又特别执拗，一言不合，说不定就要和别人动拳脚。有一次，因为闹了点纠纷，他和一个可以说是至亲的萧氏子弟在田里就打了起来，一直打了半天，两人才罢手。亲友们把沈荃看做是狂生，沈荃却也不去理会，依然我行我素。

沈荃幼年时天分极高，但是不太喜欢读书，看书只求了解大意，而不屑去做长篇大论。沈荃的哥哥沈克刚对这个不喜欢读书的弟弟管教颇多，经常指点他做八股文章，研究经史，但沈荃总是不听，而且连一次科举考场也没有进过。其兄指教无效，终究还是随他去了。

尽管如此，沈克刚对沈荃学业上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因为沈荃虽然不屑做长篇大论，却喜欢发一些高论，而他也确实才气磅礴，所发议论颇有见识，文章则慷慨激昂，辩论批驳滔滔不绝。由于当时社会风气未开，时人对此颇多指责。但沈克刚却不违背沈荃的旨趣，为他引证史事的真伪，帮助他从中引发新论，融会贯通成文。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不讨亲友喜欢的沈荃其实生来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以后的离经叛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戊戌变法之前，湖南一些既娴熟古文诗词，又关心时政的人组成了一个社团，因为里面有 12 个人，因而被人们称为“十二神”，沈荃即是其中之一。社中朋友里，沈荃和长沙的舒闰祥关系最好，因为两人同样性情豪爽，能言善辩。话逢知己，两人纵谈

天下时事，经常终日不停，置旁人的笑骂于不顾。

维新改良思潮兴起之后，沈荃也积极思变。由于是一介书生，手无寸柄，想招兵买马又无能为力，心中常常引以为恨。刚好当时长沙设立保卫局，沈荃就想去当个局长，借此位置开展组织联络、训练民众等活动，以谋求社会人心的转变。沈荃的打算自然遭到了顽固绅士的竭力阻挡。于是就想了一个很巧妙的法子，他以革命党人的名义给叶德辉、孔宪教等顽固劣绅发了几封信，询问他们组织联络的情形，准备起事的日期，而且故意让当局知道。当局知道后果然极为震怒，传讯这些劣绅。这些劣绅担心惹祸上身，于是纷纷潜逃。这样，沈荃就当上了保卫局局长，从而能够以此为基础开展活动。

戊戌变法运动兴起之时，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南学会，又办了《湘学报》和《湘报》，以此宣传民权思想和君主立宪思想，名重一时。而沈荃尽管没有参与上述活动，却与他们过从甚密，因而得以了解专制政体的弊端。如果说以前沈荃还只是持有一种似乎是天生的破坏主义的话，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宣传无疑为之注入了理论的精髓，使之对现存制度的憎恶能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纵观沈荃的一生，此时应是他思想发展的另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尽管沈荃不露头角，谭嗣同和唐才常的思想却对沈荃影响很大，这也是戊戌变法之后沈荃一直追随唐才常进行自立军勤王起义的原因所在。

拔剑起蒿莱

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在改良派亡命的日本又多了两个愤后党之奸的人。但他们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温文尔雅的保皇派有

点不一样，他们希望起兵勤王。这两个人就是沈荃和唐才常。

和谭嗣同一样，唐才常本来对戊戌变法抱有很大期望的。1898年9月，戊戌变法轰轰烈烈之际，唐才常应谭嗣同电召赴京。但唐才常刚刚抵达汉口，政变就发生了。谭嗣同大义凛然，慷慨赴难。

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关系极不一般，两人是刎颈之交，而且被并称为“浏阳二杰”。谭嗣同的死使唐才常非常悲愤，他由此产生了起兵勤王的想法。而沈荃本来就持破坏主义的观点，因而对唐才常的想法非常支持。

唐才常和沈荃先是东下，想在国内寻找机会。但由于政变刚刚发生，后党此时正大肆追捕维新改良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都纷纷逃往海外，国内万马齐喑。想到国内目前没有可以凭借之处，于是，在1898年冬，唐才常和沈荃又东渡日本。

在日本，唐才常和沈荃与梁启超等保皇派见了面，商量起兵勤王之事。

他们的想法得到了保皇派的赞同。

在日本期间，唐才常和沈荃同孙中山等革命派也有接触，双方作了殊途同归的约定。

1899年春，沈荃和唐才常一起回到上海准备勤王起义。他们首先发起成立了正气会。

正气会的宗旨主要讲的是忠君保皇，但其中又体现了唐才常思想的矛盾：其宗旨中既说“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又呼吁要“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妄议君父者，请勿列名会籍”。

沈荃在正气会中担任干事员。按照正气会的会章，干事员要由大家选举产生，凡会内的事情，必须由议员和干事员商榷，方由会长实施，因此，沈荃被选举担任干事员说明其在正气会中的

地位和威信都不错。干事员在正气会中主要负责组织联络工作，而这似乎就是沈荇的专长，因为沈荇性情豪爽，善于交际。

不久，唐才常把正气会改为自立会，然后积极组织自立军。

在组织勤王起义之时，唐才常一直周旋于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对保皇派则称勤王，对革命派则称保国保种。唐才常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宣称勤王就有可能利用保皇派的募捐，起义的资金有保障；宣称起义、保国保种则能以革命的声誉吸引有志的留学生和革命党人。但也正因为这样，唐才常的思想策略其实是矛盾的，在武装起义和勤王之间首鼠两端。

了解唐才常的思想对我们了解沈荇的思想是重要的，因为沈荇此时一直追随唐才常，是唐才常最得力的干将，而且我们没有直接的资料表明二人的思想有分歧。这里，我们可以把沈荇和章太炎做一个对比。

章太炎也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结识了唐才常，也参加了唐才常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会成立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章太炎告别了保皇派。

中国国会的宗旨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唐才常思想上的矛盾：他一方面要求决不承认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术，另一方面却又要请光绪帝复辟。既然清政府不能统治中国，为什么又要请光绪复辟呢？自相矛盾，自然荒唐可笑。章太炎在会议上指责了唐才常，为表明自己和保皇派的决裂之情，章太炎手起刀落，以断发明志，从此思想转向了革命。而沈荇在这次保皇与革命分流的会议上却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甚至疑问。这说明他的思想与唐才常还是同一步调的，即使与唐才常有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沈荇此时的思想其实也是在革命与保皇之间徘徊。

沈荇为唐才常的勤王起义做了大量组织工作。

勤王需要武装力量，而唐才常并没有自己的军队，他的自立军是在哥老会和湖北新军中发展的，而新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功于沈荃。沈荃何以有如此的本事呢？这要归功于他关系的熟稔和娴熟的交际能力。

谭嗣同的父亲当湖北巡抚时，沈荃曾在其手下做过抚署文案，因而对湖北的大小官吏以及军中兵勇、社会下层人士极为熟稔。同时，沈荃又善于交际，性格豪爽，而且不辞劳苦，为发展一个人，他可以天天找其谈话，直到其答应为止。沈荃发展张之洞的威字营统领黄忠浩时就用了这一招。黄忠浩与张之洞关系密切，他驻汉时，张之洞时常有书信给他。当他移驻龟山后，沈荃天天过江找他谈话，从早到晚，苦口婆心，一连说了一个星期，终于将黄忠浩说动了心。主将加入了自立会，手下人自然就踊跃加入。后来自立军起义失败，湖北巡抚在审问时发现有的自立会下层干部是威字营中人，因而转脸对黄忠浩说：“一拿是你黄中书营内人，再拿又是你黄中书营内人，你黄中书营内占得好多分子呀。”不过，由于有张之洞的庇护，黄忠浩后来依然在清朝做官。

沈荃的触角甚至伸到了张之洞处。自立军在湖北新军中大量发展，张之洞不可能没有听说，但张一直置若罔闻，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沈荃辗转托人联络，将拥张之洞自立的消息传到了张的耳里。张之洞老谋深算，并没有表态，但实际上对自立会的活动也没有干涉。只是后来由于唐才常宣言将对张之洞不利，张才先发制人，大肆搜捕自立会人。张之洞在搜索时才发现，湖北大小官吏中，自道府以下已经有 200 余员隶属自立军，而中间多数是沈荃发展的。

唐才常本来决定了统一起义的时间，后来由于保皇会的募款迟迟未来，所以一再延期。可是秦力山没有接到延期的通知，于

是按原定时间在安徽大通先期起义，由于没有援兵而失败。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起义由于张之洞的破坏也没有成功，唐才常等人蒙难，而沈荃由于远在湖北新堤而得以逃脱。

中国近代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

1900年八九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气度不凡的白面书生，他出入上流社会，和京官大吏广泛接触，时而饮酒言欢，时而为麻雀戏，好一派闲散悠然的生活。

这个人就是沈荃。

可是他心里真像表面一样悠闲，真的没有什么打算吗？

当然不是。

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武汉全城戒严盘查，大肆捕杀自立会人，这时，沈荃却冒险回了武昌，躲在好友舒闰祥家中。他把一切善后事宜交代好后，又化装潜入了上海。

在上海，沈荃的思想开始脱离保皇，转向革命。他和章太炎、杨笃生等主持《大陆报》，鼓吹革命。不久又加入戢元丞创设的新社，排斥康、梁的保皇学说。

这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可是沈荃心中却时时有隐隐的痛。国家沉沦到了现在这个境地，自己的至友为之献出了生命，如何才能挽救危亡。上海离清政府太远了，应该到北京去，到清王朝的心脏去，擒贼先擒王，把那拉氏和清帝杀了，清朝不就完结了吗？

他决计进京。于是，他把名字由沈克誠改为沈荃，朝着理想之地进发。

沈荃在北京的目的是刺杀慈禧和清帝。在这之前，他想方设法得到了《中俄密约》。

1903年，清朝多次与沙俄谈判东北撤兵问题，可俄国不但不

撤兵，反而提出了将东三省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七项要求。

《中俄密约》虽然得到了清廷内联俄派的允诺，外界却一点也不知晓。可是突然，密约却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发表了，很快，日本报纸上也出现了这一消息，街头“号外号外”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轩然大波由此而起。上海的革命党人首先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不仅向清政府表示“全国人民万难承认”，而且向各国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认，全国人民万不承认。接着，东京的留学生也组织了拒俄运动，并且成立了拒俄义勇军。很快，拒俄风潮席卷全国。

清政府措手不及。后来经过侦查才知道沈荃在北京与达官贵人结识，与激进派有来往，而且又是日本报纸的通讯员，所以透露《中俄密约》的必是沈荃无疑。

透露密约的确实是沈荃，他是从政务处大臣王文韶的儿子和亲友手中得到的。得到密约后，他马上将之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发表。

清政府对泄露密约的沈荃恨之入骨，自然以得之为快，恰好沈荃又交了两个利欲熏心的损友。于是损友告密，沈荃入狱。

出卖沈荃的是庆宽和吴式钊。

庆宽是内务府的汉人，沈荃来京之后，他热情款待，曲意结交。沈荃对金石之类有嗜好，庆宽于是也附庸风雅，与之探讨。沈荃本是豪爽、实在之人，因而也将庆宽作为自己的朋友，还想通过他与太监李莲英联系，以刺杀慈禧。而吴式钊本是沈荃在湖南时的旧相识，沈荃为“十二神”之一时，他在湘社，彼此熟悉。吴式钊曾因事被递解回原籍，此次来北京，当然想谋求复官之道。旧相识在北京相遇，沈荃自然十分高兴，但却没有想到吴式钊却是

个心胸狭隘的小人。不过，这也与沈荃口舌犀利有关。吴式钊不学无术，连写书信都有许多别字，而沈荃虽然不喜欢舞文弄墨，却对吴式钊的这一点非常不屑，曾经对人嘲讽过吴式钊，吴因此仇恨在心，想乘隙报复。

刚好，沈荃因揭发《中俄密约》的事情被清政府视为眼中钉，于是庆、吴两人就开始联手出卖沈荃。

他们通过李莲英向慈禧告发沈荃，接着又派吴式钊的妻侄倪世仪作眼线紧盯着沈荃。1903年7月19日，在庆宽的带领下，慈禧派人将沈荃抓获。

从刑部的奏折来看，清政府对沈荃判斩立决是根据自立军起义的“富有票”案。刑部的奏折是这么写的：

此案该犯沈克诚，听从梁启超等私设自立会，散发富有票，乘机煽乱，该犯虽未放票，惟既充当干事员，即属会匪头目，不法已极，应将沈荃即沈克诚照章拟斩立决。

所谓富有票就是当初自立会为发展人员，仿效会党进行组织联络所发出的一种票据，凡出一定的钱买下该票即是入会。

自立会起义早已时过境迁，清政府以此为定案之罪实际上是掩人耳目。《中俄密约》的泄露已使清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再白纸黑字地以泄露密约为罪将人定案，似乎太明目张胆了，干脆以他事定案，来个人不知鬼不觉。

慈禧既有此打算，所以特派了一个承审官。承审官审问时既不将被告诸情节告诉沈荃，也不问他富有票案的事情，反正要以此定罪，干脆不问。而且若是一问，万一沈荃说出《中俄密约》的事，全盘打算岂不落空？所以他根本没想问沈荃什么，只想对沈荃动动大刑，泄泄心头之火。

可是，承审官不问，沈荃却侃侃而谈。他对自立军起义勤王

的庚子之役丝毫不回避，而且神态自若地说：“我从前是富有票，现在不止于富有票。”

开始沈荃只知道自己是被庆宽所害，却不知道吴式钊也参与此事，后来沈荃提出想知道谁是告发者，承审官于是出示了吴式钊的证词，沈荃这才知道被密友所卖。

沈荃被捕前后，恰好在上海发生了“苏报案”：因宣传革命，《苏报》被封，章太炎、邹容等被逮捕。“苏报案”中，清政府的本意是想将章、邹二人引渡，然后判个斩刑，所以一直在与上海租界当局和各国领事交涉。而各国为维护自己的治外法权，却坚持租界之案要在租界审讯。交涉良久，一直悬而不决。

“苏报案”交涉拖延日久让慈禧非常不快，可她对各国却无计可施。而此时，沈荃又是一副傲岸不屈的模样，于是慈禧满腔的邪火就转向了沈荃。

7月31日，慈禧急匆匆地发了这样一个谕旨：万寿月内例不行刑，着即日立毙杖下，钦此。

谕旨在当天得到了执行，沈荃在被轮番鞭打了四个小时后，依然没死，于是被用绳子绞杀。

慈禧将对章、邹的怒火发泄到了沈荃身上，却没想到沈荃死后反使各国公使坚定了不将章、邹引渡的决心，章太炎和邹容最终在租界受到审讯。

民生的凋敝，外患的忧虑仿佛瞬间就从遥远的地方逼近了眼前。该如何挽回危局，卞小吾在苦苦思索着。

危言危行以济时

——记被清政府残杀的报人卞小吾

四川成都。

1908年5月15日。

《重庆日报》的创办人卞小吾已经在成都被监禁三年了，却一直没有人来审问他，也一直没有定罪，而意外却在今晚发生了。

夜色笼罩大地，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与安逸，谁都没有想到，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也在夜幕中进行。

夜色越来越深，忽然，监狱的人被一阵惨厉的呼声从睡梦中惊醒。一间狱室里，几个人手持匕首正在追杀一个长着一头乱蓬蓬头发和一嘴大胡子的人，那个人却手无寸铁。几人绕室追逐，满地是血。门锁着，这个人自然逃不出去，而惨厉的呼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却一直没有人来制止这样的暴行——犯人们是无法来救的，而狱卒们则似乎全化成了空气从监狱里消失了一样。

被追杀的这个人就是卞小吾。第二天夜里，参与追杀的一个同狱犯人也死了，他是中毒而死的。于是，在监狱当局的口中，卞小吾被杀死就变成了同狱犯人的仇杀事件，而另一个犯人则被说成是畏罪自杀。

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清政府官吏安排好的，既泄心头之恨，又掩盖了绞杀革命宣传者之恶名。

仗义执言的“大头摆”

卞小吾在家乡期间有个外号叫“大头摆”，这是因为其家乡历任县令一听他求见就摇头摆脑，颇为为难：拒绝嘛，不行，接见呢，又有叫人难处难办的事情。

卞小吾生于 1872 年，名鼐，小吾是他的字。卞小吾的祖上原本居住在江南，在明朝末年移居四川省江津县稿子乡龙井湾，到卞小吾时，其家在四川已经居住了 20 代。卞家在当地是十大封建家族之一，也说得上是世代书香门第，因此家里积极督促子弟准备科举考试，走传统的仕宦道路。迫于祖训，卞小吾参加过科举考试，而且一举成名，但从他自己的心性而言，走科举道路、做八股文章实非自己所愿，所以他后来并没有在科举的道路上耗费时日，而是投身报业。

卞小吾从小就性情豪迈。他喜欢交游，路遇不平之事，总是拔刀相助。而对于官吏的贪污勒索，营私舞弊之举，更是无所畏惧，大胆揭发抨击。卞小吾既然是这样一个让官吏头痛的人物，“大头摆”的外号就这么叫出来了。官吏们对他很是头痛，普通的乡民却非常尊敬他，若有纠纷，只要卞小吾开口表了态，大家都表示服从。

卞小吾生活的年代正是旧中国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年代。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之变，一系列的内忧外患推动着卞小吾和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走上了鼓吹革命的道路。不过，在江津时期，卞小吾思想上的革命意识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卞小吾的革命思想来源于明末政治思想家黄宗羲的“君为天下之大害”的思想。与许多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卞小吾对经过

之学十分精通。在研习这些学说时，他又格外留心历朝兴亡之道，特别对于明末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黄宗羲的思想十分向往。“君为天下之大害”是黄宗羲思想的精髓，而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接近近代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而黄宗羲本人又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因此，卞小吾在黄宗羲这里不仅受到了传统的夷夏之防思想的影响，而且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滋养，这为他后来转向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很快，周围世界的变化促使了卞小吾革命思想的萌芽进一步发展。

1901年，清政府和侵华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 4.5 亿两。沉重的赔款负担自然是由老百姓来承担的。四川省从 1902 年起，每年要摊派赔款 220 万两，各项苛捐杂税比以往一下多增加了 10 倍，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又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其触角远远伸入内陆。1901 年，日本在重庆设立了租界。1902 年签订的《中英通商条约》又把四川万县辟为商埠。

民生的凋敝，外患的忧虑仿佛一瞬间就从遥远的地方逼近了眼前。如果说卞小吾以前还只是对自己周围的贪官污吏愤恨不已，在这时候，这种愤恨就不由自主地指向了清政府。该如何挽回危局，卞小吾在苦苦思索着。

1902 年，在邹容、吴玉章都从四川走出奔赴日本留学之时，卞小吾也走出了四川，但他并没有出国留学，他去的是北京和上海。这是他和至交杨沧白等人商量后的决定。四川当时地处西南边陲，毕竟太遥远了，而只有到一国之都的京师重地和那个汇聚各种潮

流的上海，才能知道天下大势是什么，别人在做什么，而自己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卞小吾首先到了北京，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亲身感受了人们对这个朝廷的绝望之情。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革命思潮兴起的情况：尽管孙中山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甲午战争之后就产生了推翻清朝的念头，并为之奋斗不已，但从整个社会而言，在 19 世纪末期，人们忧虑的是外患，期望以维新变法挽救危亡。而在 1900 年庚子之变后，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就转向了清政府，期望用革命手段将之推翻。

北京之行使卞小吾“革命志益坚”。但卞小吾在北京并没有呆多久，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北京甫经兵祸，清政府戒备森严，让人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卞小吾在北京并没有找到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于是，在 1902 年冬天，卞小吾南下来到了上海。

卞小吾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尽管当时人心思变，但公开的反清宣传除在清政府鞭长莫及的日本和香港之外，在国内却不多见，而上海却是当时反清志士汇集，反清思潮风起云涌之地。

上海对卞小吾来说真是一个新的天地。在这里，他认识了马君武、谢无量 and 冯自由，还结识了后来《苏报》的主笔章士钊。卞小吾与他们来往非常密切，大家在一起畅谈国事，无所顾忌。除了与这些革命党人接触外，他还经常去爱国学社，参加爱国学社在张园举办的演讲会，“每会必至，每至总有所得”。不久，章士钊任《苏报》主笔，更是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进行革命宣传，使《苏报》走上了光辉灿烂的巅峰。卞小吾对《苏报》的文章极为赞赏，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更让其赞叹感动不已。

张园的演说和《苏报》的宣传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从捉拿在张园演说的爱国新党开始，经《苏报》后阶段激进的宣传，

捉拿新党演变成了“苏报案”。结果，《苏报》被查封，章太炎、邹容入狱，而邹容由于不耐狱中的艰苦病死狱中。

“苏报案”发生时，卞小吾还在上海。此时的卞小吾心中，反清思潮已经在激荡，而清政府对《苏报》的扼杀，又使他的心情极为抑郁。同北京一样，上海此时也正当其锋芒，而四川地处西南边陲，能否向那边转移呢？为此，卞小吾曾三次进狱中与邹容、章太炎商量继续革命的办法，一致认为四川地处边陲，民智未开，是一个谋事的好地方，应该赶快回川图谋。

办起四川第一家日报

1904年2月，卞小吾回到了四川重庆。

在重庆，他与一些革命党人畅谈了京、沪之地的革命形势以及上海革命党人的期望，并开始着手进行各项活动。

卞小吾的第一招也是最有力的一招是办报。

卞小吾的办报主张，得到了重庆革命党人的支持，但由于经费问题，报纸迟迟不能创办。卞小吾左思右想：此时正为关键时期，报纸能够集合人心，如果就此拖延而错过了，说不定就会导致人心涣散。于是他回到了江津，和他的二哥商量，将自己和二哥两房祖传的田产卖了。带着变卖田产所得的6000元钱，他又去了重庆。1904年9月，四川的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在重庆创刊发行。

为避免清政府官吏的迫害，卞小吾想出了挂洋旗的办法，聘请了一个进步的日本人竹川藤太郎作社长，自己则以记者的身份进行活动。

《重庆日报》创办以来，积极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官吏的贪污，民生的凋敝，列强的侵略，并且不断报道四川人民争取川汉铁路

权利的消息，因此对于凝聚民心，促进收回权利的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重庆日报》的上述宣传也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在报纸初创办时，每日的销量只有 500 份，其中还有许多是赠阅，到 1905 年 4 月时，已经增加到了 3000 份。

在重庆期间，卞小吾除了办报外，还办起了实业和学堂。他认为洋货充斥市场是导致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所以想自力更生，自办实业，抵制外国货；而当时旧的科举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但新型的学校尚未创办，应该办新学堂，吸取欧美和日本的先进科学知识以开民智。于是，他集资在重庆办起了东华火柴公司，又办起了东文学堂和女工讲习所。东文学堂注重日语的讲授，请了《重庆日报》的挂名社长竹川藤太郎担任日语教员，为派遣留日学生做准备。尔后卞小吾还筹资送了两个东文学堂的学生去日本留学。女工讲习所则是半工半读性质，既教授文化，又传授技术。卞小吾对办学非常精心，经常自己授课，讲述救亡图存的道理。

卞小吾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清政府官僚的注意。

骂慈禧为老妓

1905 年 4 月 29 日早晨。

重庆方家什字路口。

有一群衙役躲进了路口拐弯处的茶馆。他们并不是来喝茶的，而是来抓卞小吾的，因为方家什字路口是卞小吾去女工讲习所的必经之地。

这一天，卞小吾和往常一样，走在去女工讲习所的路上，却没想到，这一走竟再也没能回来。

在卞小吾走过方家什字路口之时，衙役们从茶馆冲了出来，他们冲到卞小吾面前，仿佛很恭敬地请他去巴县衙门谈话。

那么多人冲出来，还说请去衙门谈话，自然非同寻常。卞小吾于是推托说等回家换了衣服乘轿再去。瞬间，卞小吾周围又聚集了数十个人，不由他分说，一拥而上，强行将卞小吾劫持上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官轿，一路向巴县衙门飞奔而去。

卞小吾遭劫持后，马上就被软禁起来，而且官方严密封锁消息。当时重庆的革命党人和亲朋好友为营救卞小吾，曾多方打听奔走，无奈清政府封锁极为严密，一律矢口否认。所以各方人士不仅连见卞小吾一面都不可得，而且连卞小吾软禁在何处也不知道，更没有见到官方公开审问一次。

卞小吾在巴县衙门被软禁十余天后，于 5 月中旬被送往省城成都，在成都科甲巷待质所监禁起来。临行前，解差把锁链的一端锁在卞小吾手上，另一端锁在轿竿上。解差当时对卞小吾这样解释：“委屈点，革命党人有武事，不这样做，不足以防逃逸。”卞小吾则笑着说：“借此锻炼锻炼大佳。”

清政府之所以将卞小吾视为眼中钉，是因为《重庆日报》不断报道四川人民争取川汉铁路权利的消息，由此造成了一种宣传反清的风潮。川督锡良因此对《重庆日报》的报道非常仇视，秘密下令川东道道台贺某、重庆府知府鄂芳妥善办理。但由于锡良要求事情既不能引起外交上的纠纷——因为《重庆日报》的挂名社长是日本人，又不能刺激革命党人——这是“苏报案”给他们的教训，所以事情一时不好下手。而卞小吾对慈禧的严辞嘲骂加速了锡良的行动。

慈禧为筹备自己的寿辰，将甲午战败后兴办海军的军费移作建颐和园之用，卞小吾得知此消息后，在《重庆日报》上报道的标题是：《老妓在颐和园之淫行》。当初《苏报》被清政府指控，有一条证据就是章太炎的文章骂光绪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而